

简论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双轮驱动”

丁龙嘉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 济南 250001)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 党和政府顶层将突破口选择在国营企业, 企图通过“放权让利”的方法振兴社会主义经济。但由于引起的严重的体制摩擦等原因, 致使未能取得突破而驱动起改革开放之车。却是源自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驱动起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笔者称之为“双轮驱动”。35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证明了“双轮驱动”的观点是成立的。

【关键词】改革开放; 初始阶段; “双轮驱动”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13)05-0004-03

—

系统阐述中国改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和王宁, 提出了中国改革双源说, 即一个是中国政府推动的改革, 一个是“边缘革命”。所谓“边缘革命”, 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被计划经济制度边缘化了的经济力量发起的四大“革命”, 一是农村兴起的包产包干到户, 二是乡镇企业引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 三是返城知青的创业及城镇个体经济的崛起, 四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开辟和发展。他们同时提出了官方和民间一起改革, 共同打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1]

笔者认为, 这四大“边缘革命”, 对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 不能等量齐观。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 因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是由于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而引出的。包产包干到户的实行, 其作用, 不只是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部分产品所有权, 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使农业、农村、农民获得了“经济自由”。正是由于有了“经济自由”, 才出现了1984年之后乡镇企业的强劲发展, 从而引领了农村工业化革命。应该指出的是, 其次, 作为返城知青的创业及城镇个体经济的崛起, 虽然于1981年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但它对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驱动作用, 稍逊于其它三大“边缘革命”。据上所述, 对于初始阶段的中国改革开放, 兴起于农村的包产包干到户,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 这二者最具有意义。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是如何起步的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人们思想解放打碎了枷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 为整个社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这一背景下, 党和政府的顶层在推动改革, 党和政府的基层以及民众也在进行改革; 前者的改革主要是对国营企业“放权让利”,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的经济活力, 但也引出了严重的体制摩擦, 而没能驱动起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后者的改革主要是四大“边缘革命”, 这虽然是“边缘革命”, 但这四大“革命”, 又主要是农村的包产包干到户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立、发展, 却驱动起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笔者称之为“双轮驱动”。这里, 有一点必须指出, 四大“边缘革命”不是在各个省、市、自治区同时发生的, 而是在少数省、市、自治区突破的, 再由个别带动一般。

二

党和政府顶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 选择的

【收稿日期】2013-09-10

【作者简介】丁龙嘉(1947-) 男, 山东乳山人, 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万里图书馆副馆长,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教授。

突破口是国营企业,办法是“放权让利”,目的是振兴社会主义经济。

实际情况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某些省、市就着手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1978年至1980年,顶层一直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上。但是,长久以来,国营企业受到政府部门的强力控制和约束,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而且产业结构支离破碎,不利于生产发展,改革是不易的。应该承认,通过“放权让利”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自身取得了进展,但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相反,因为国营企业能够保留一部分利润用以支撑生产和职工薪酬,所以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国家财政陷入赤字,通货膨胀压力沉重。1978年国家财政结余10.1亿元,而1979年国家财政赤字竟达到170.6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1980年国家财政赤字依然在高位上徘徊,为127.5亿元。同在1980年,全国综合物价指数上升至6%,有的城市则超过了8%,可长期以来物价一直控制在1%的波动范围内。对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如此的赤字和通胀极易失控,从而导致社会动荡。这不能不引起党和政府顶层的高度重视。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党和政府顶层于1980年底确立了经济紧缩政策,决定改革服从调整。1981年初,国务院就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作出决定,其中规定:努力增加收入,坚决压缩支出,保证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收支平衡;坚决维护国家的税法制度,不许随意改变税种、税率和减免税;努力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保证企业利润及时定额地上缴国家。加上其它措施,1981年的国家财政赤字降至25.5亿元。就是这样,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的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没有驱动起中国改革开放之车。而驱动起中国改革开放之车的历史责任落到了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三

1978年前后,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兴起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兴起的包干到户,是在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顶着巨大政治压力、排除种种阻力之下,由山南、小岗走向江淮大地,再由江淮大地走向神州各地的。

包产包干到户一面世就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因为中共中央的文件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宪法也明文禁止包产到户。从不合法到合法,同“左”倾错误在观念和体制方面的斗争与突破是主线。首先是突破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其次是

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包干到组。再次是突破“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到1980年初,以万里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为包产包干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但这个“户口”是安徽地方“户口”,在全国依然不合法。这年9月,中共中央的文件将包产到户仅限于“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和当地生产队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地区”以及“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这虽然还是在遏制,但是毕竟开了一条小小门缝。门缝一开,迎来的必然是大门洞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982年1月,中共中央顺应大势,正式承认包产包干到户姓“社”不姓“资”。不久,包产包干到户被专家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大潮中,存在20多年的人民公社解体了。迄今为止,农村改革是最具体体制性的改革。

1978年末至1980年8月,广东为了解决“逃港”等棘手问题,是在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向中央要权力要政策、得到中央同意之后,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在广东省,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偷渡外逃”高潮,当时面临的依然是传统的政治或军事打压。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在邓小平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的谈话启发下,经过实际调查,认识到:“逃港”的原因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要想杜绝非法移民,只有缩小香港和内地的经济鸿沟,否则,任何政治和军事手段都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请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贸易合作区后来改称为经济特区。在上述背景下,1979年7月15日,“中发50号文件”决定:粤闽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国民经济尽快搞上去;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赋予经济特区很大的自主权,使其经济体制“跳出现行的体制之外”。这无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

四

对于安徽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邓小平曾作如下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2]

对于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中央曾这样评价,“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3]今天看来,上述评价是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起源于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在短期内解决了困扰党和政府顶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从而稳住了农村这个大头,在社会舆论、政治环境、物质资源诸方面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仅下面这一史实,就可支撑起这一观点。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1978年为30477万吨,1984年达到40712万吨,六年的时间年产量增加了1000多万吨,人均占有800斤,接近世界水平。不可设想,没有安徽的开拓,中国能有长时期的改革开放发展?!

(二)起源于安徽的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包产包干到户,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农村改革的历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就是试行市场经济。这种市场化的试验,发挥了为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路先锋作用。不可设想,没有安徽和广东的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在中国确立起来?!

(三)起源于安徽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村改革和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突破了长期对外对内的封闭,实现了对外对内的开放。对于开放的理解,不能只理解为对外开放,还应理解为对内开放。包产包干到户实行后,引起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扩大了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使农村经济超越了地域、部门乃至国家的局限。这种国内和国际的两个交融,对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于引进外部的技术和资金,对于利用世界市场发展自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典范作用。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使开放从经济特区发展到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区,又发展到大陆腹地。不可设想,没有安徽和广东的开拓,中国能与世界接轨?!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改革开放的历程还是从改革开放35年后的现实看,或者是从近代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发展的个别规律思考,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双轮驱动’”的观点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 变革中国[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

[2] 《万里文选》编辑组.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N]. 人民日报,1995-10-05.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习仲勋同志生平[N]. 人民日报,2002-05-31.

(责任编辑 梅焕钧)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wo-wheel Driving" System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Ding Long-jia

(Associate Director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Jinan Shandong 250001)

Abstrac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hos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breakthrough, trying to boost Social Economy by the method of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ransfer of profits". However this trial has not broken through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due to reasons such as serious system frictions. It was the rural reform in Anhui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Guangd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at drove the wheel the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se two are called "two-wheel driving" system by the author, and according to 35 years'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proves the property of "two-wheel driving" system view point.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itial stage; Two-wheel driving